

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從十七大報告中可以看出，中共領導人將會繼續堅持改革開放的原則。這一方面是因為改革開放帶來的經濟發展，已經成為中共執政最重要的合法性來源，「發展」等同是中國大陸的代名詞。而如何客觀而正確地評價與總結基於五年實踐的科學發展觀，是十七大的一項重要任務，亦是中共中央繼續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要求。然而科學發展觀並不是無懈可擊的發展理論，未能從制度上根本扭轉的論述將倍受考驗。

一、科學發展觀的提出與建立是由於中國大陸社會不和諧程度漸趨嚴重，欲藉由發展模式轉化來改善。

諸多的發展問題在發展過程中不斷湧現，社會不和諧程度漸趨嚴重，既有的發展模式已經無法滿足中國大陸民眾的需求。因此，發展思維革新及轉變發展模式是為了改善發展困難的必要手段，是永續發展的必要措施，也是科學發展觀的提出與建立之理由。

從理論角度切入，陳文通等學者認為科學發展觀的提出是對西方發展理論進行揚棄的結果。當代西方社會發展理論，在 20 世紀經歷了 40 年代的「發展經濟學」、50 年代興起的「現代化理論」、70 年代的「依附論」與「世界體系論」、80 年代的「新發展觀」、90 年代的「文明衝突論」等理論型態的更迭。這些西方發展理論，目的在為不發達國家實現現代化提供理論指導和政策導向，而且確實發揮了很大的作用。³²⁰但理論的建立是不斷修正與完善的過程，發展理論不必然就需要揚棄，而是應從既有觀點來檢視當前發展中的問題，以尋求借鑑與解決之道。

現代化理論中強調必須突破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之間的某個「臨界點」，才能啟動向現代社會的轉型，這與十七大報告中所提「全面小康社會的內涵之一是實現人均 GDP 到 2020 年比 2000 年翻兩番」³²¹

³²⁰ 陳文通等著，《科學發展觀新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年 5 月，頁 9。

³²¹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2000 年中國人均 GDP 為 7,078 元，按當年匯率折算為約 856

的意思是相同的，也就是說中共的科學發展觀中還是有現代化理論的「點」的跨越這種思維在。另外，現代化理論認為要實現現代化，就必須要西方化或者照搬西方的發展模式，此與十七大報告中所闡述「在保持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中國將堅持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道路，而不是照搬西方的發展模式」便有所不同。

透過對外開放，全球化使得中國大陸成功地取得發展的機遇，尤其是加入世貿組織後，更讓中國大陸經濟國際化程度提高，使其對攸關國際經濟的思維方式、行為模式乃至解決問題的方法、工具均逐漸的與普世原則趨近。雖然依附理論特別強調外因在社會發展中的負面影響，即認為外國資本的介入是弊大於利，中國大陸經濟對國際市場的倚賴程度過高的情況並未有減緩的趨向。

以貿易和外向型為主導的中國經濟，其發展緊緊地依附在全球經濟失衡發展的主體上，全球經濟結構的失衡與調整，直接影響著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可持續。因為中國大陸的發展模式主要是以依靠投資與「三外」（外貿、外資、外金）所推動的發展模式，這種發展模式的代價相當龐大，有危及國家安全之虞。當前中國大陸的外貿依存度已逾 80%，一旦受到全球經濟失衡的波及，中國大陸的經濟將遭受巨大的重擊，後果難以估量。因此，創新發展模式，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大力擴展內需，盡可能地避免發展受到外力的限制。

依附理論暗示著第三世界國家易陷入惡性循環的困境中，會因為追求發展而對核心國家的依附加深而無法獲得發展，不過中國大陸仍藉由外國資本與技術取得不小的成就，但是想要轉型與轉化發展模式的過程中，確實有一定程度受到外國勢力的影響，畢竟外國企業投資就是要利用低廉的勞動力，如果要重視生態環境、提昇勞工保障等，這些成本勢必水漲船高，外國企業很可能轉移投資，造成更多人失業，當前農民工提前返鄉的問題就是一個警訊。

通常依附會造成經濟成長的緩慢，一個國家對外來的投資和援助，依附程度愈高，則它的經濟成長愈緩慢。不過，中國大陸並不因為依附其他國家的發展而更不發達，而是獲得發展的契機。然而，依

美元。如果 2020 年實現翻兩番，那麼到時候人均 GDP 應該達到 3,500 美元左右。

附會造成單一國家國內的所得分配不平均。如果外資外援愈多，這個國家國內的所得分配就會愈不平均。這點則是在中國大陸深刻地體現出來，收入差距不斷擴大亦是貧富差距問題加重的主因之一。

世界體系理論是一種動態的發展模式，它認為在世界體系整體發展規律的作用下，單一國家在世界體系中的地位是可以改變的，各個國家都可能在核心—半邊陲—邊陲三級結構中流動，中國大陸確實有向核心國家流動的跡象。不過，半邊陲國家指那些既可以某種程度上控制邊陲國家，又在某種程度上受控於核心國家的國家。正當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體系迅速向一體化方向發展之際，世界各個國家的經濟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使得經濟全球化的趨勢難以逆轉。號稱是社會主義的中國也不可避免地要捲入到這一體系內，這一體系的實質就是世界性的市場化。因此，中國大陸當前的發展處於這種狀態之下，其發展模式轉化可說是機遇與挑戰並存。

華勒斯坦認為國家其基本職能是通過干預市場運行來促進資本積累，影響收入分配。因此，國家不是守夜人，而是參與者，它直接介入經濟領域，協助資產階級進行剝削。此論述正是與中共當初選擇不平衡發展的手段是一致的，而目前回歸社會主義路線就是國家再透過重分配等方式來提升發展滯後者的提升，但由於涉及龐大的利益結構，如果發展優先者沒有將經濟增長為首的發展思維轉向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調整，發展模式的轉化就難以樂觀。

另外，世界體系理論認為國家及其發展的狀況和程度都是由世界體系決定的，就剝奪了單一國家的能動性與自主性。發展理論原本的目的在於指導發展中國家尋求發展的道路及模式，但它卻表示國家自身的努力是無意義的，主要是憑世界體系的安排，這點並不符合中國大陸的發展實踐。其中一部分的原因或許是世界體系理論以資本主義為基礎與中共所強調的社會主義路線有所不同所產生的實踐落差。

發展觀的不斷修正與創新確實有助於發展模式的轉化。科學發展觀的建立從發展上而言有下列歸納：

一、科學發展觀是中共確實為了全民福祉所做的發展觀轉型，同時也具有鞏固政權的考量。

二、科學發展觀的理念有助於中共推展思維創新與制度改革，但是在實踐的過程中難度很高。

三、科學發展觀的實踐雖然難度很高，但是對於發展模式的轉化仍有促進的效果。

四、科學發展觀依然遵循「摸著石頭過河」的思維，社會穩定的優先性仍是在發展與改革之上。

二、從以經濟發展為主的發展戰略及發展模式轉化為重視社會公平正義的模式。

就國家發展的規劃而言，十七大報告並沒有出人意表的變化，因為十七大揭櫫的政策方向，仍將延續胡錦濤的既有路線，高舉「科學發展觀」，企盼能建立和諧、均富、統籌的「全面小康社會」。從宏觀角度來看，政治報告最為突出的特點是：「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的理念，這與中共過去的政治報告相較是最為迥異之處。

「科學發展觀」可說是胡溫體制國家建設的綱領，但什麼才是「科學發展觀」呢？根據胡錦濤為中共十七大定調的「625講話」中強調：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換言之，「科學發展觀」具有四個元素，整體看來，就是既維持經濟發展(而且是調整提昇後的發展模式)，又要兼顧均衡分配與社會正義，這樣才能滿足大多數人民的期待，其中包括強化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正當性，為永續執政厚植根基。

不同於過去歷次的「政治報告」，均將「社會建設」視為「經濟建設」的一部分，此次將「社會建設」單獨列出，表示中共正視嚴峻的社會形勢。奠基於鄧、江時代的開放政策，加上多年的高速成長，造成中國大陸嚴重的分配惡化與廣泛的社會不滿，可能因此導致「亡黨亡國」。因此，提升「社會建設」的重要性，確為切合時代需要，針對現有危機的反應結果。

十七大的政策方向，主要由三個核心成份「扶助弱勢」、「調節分配」、「務實親民」所組成。首先是「扶助弱勢」。胡錦濤的政策方案，一方面將重心放在解決百姓最直接、最現實的民生問題上(例如「民

生三大難」³²²)，另一方面則將優先派給現實生活最困難的群體。例如連續五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均主要鎖定三農問題，並推動優先改善農村教育、積極進行就業輔導、全面建構基礎社保、持續強化醫療衛生體系等。例如近年投注在醫療衛生方面的資源，每年增長的幅度平均在 20% 以上，並推動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彌合城鄉衛生資源分配不均，新的農村合作醫療試點範圍已涵蓋 4 億多農民，而患者的人均住院費首次呈現負增長。此外，為促進教育的普及，政府免除農村義務教育的學雜費，使得 1 億 5 千萬中小學生家庭，能大幅減輕經濟負擔。

其次為「調節分配」，希望能讓「發展果實為全民共享」。因此，在胡錦濤帶領下，政府不斷打擊各種貪污腐敗，並對收入分配進行調節。例如近年輿論與政府的推動下，電力、公交等「限制壟斷行業」，被要求停止各種職工優惠。之後勞動部和財政部並聯名發出通知，要求限制收入過高行業的工資上調比率，從而掀起了一場所謂的「減薪風暴」。換言之，唯有「規範分配秩序，理順分配關係」，才是通往「化解民怨、和諧社會」的不二法門。

最後在做法上，胡錦濤強調要「務實親民」，所謂「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換言之，胡要求眾多官員，以「群眾利益無小事」的態度，「凡是涉及群眾的切身利益和實際困難的事情，再小也要竭盡全力去辦。」如此，方能以人為本，爭取民心向背。對此的例證，則是在 2004 年，中共將教育亂收費、醫療服務中的不正之風、公路收費三亂、城鎮居民拆遷、徵用農民土地等關乎百姓切身利益的問題，寫進了中央紀委全體會議的公報，這樣一種史無前例的做法，充分顯示胡錦濤對於落實社會建設的要求。

當然上述政策方向，已確立於 2003 年召開的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展望未來，其提法雖有不同，但方向轉變則不大。從這個角度看，可說鄧小平所確立的發展策略，直到胡錦濤時期，方才出現結構性的調整。在此之前，無論鄧小平或江澤民，均盼利用快速增長的辦法，試圖做大蛋糕，藉此解決分配問題。但 90 年代中期以降，顯現「發展越快速、分配越惡化」的趨勢，整個社會面臨「斷裂」危機，之前

³²² 即買房貴、上學貴、看病貴等三大困難。

的發展策略，顯然存在嚴重的侷限。

在江澤民任內即便危機早已浮現，中共仍立意擴大「既得利益」的陣營，試圖將資本家、知識界納入結盟範疇，並未正面面對轉型過程的相對剝奪群體。直到胡錦濤接掌政權，提出「以人為本」，要求「務實親民」，一切以群眾利益為先，並且額外照顧「弱勢群體」。從這個角度看，直到科學發展觀的提出，中共方才真正展開國家發展方略的修訂，逐漸建構福利型國家，以溫和的社會主義，調節漫無節制的資本主義。如果持續科學發展觀所規劃的發展方向，則十七大後的中國大陸，將可望走向「溫和社會主義」，並由於強調「以人為本」、「善體民意」，隨之而來的政治體制，也可望轉向「柔性威權體制」，益加促進社會公平的提升。

「科學發展」的理念具體體現於此次的「政治報告」中，許多新提法諸如：首次使用「經濟發展」取代之以前慣用的「經濟增長」，代表從「量」的加快，轉向「質」的提升；首次把「生態文明」納入；從前用「總量」國民生產總值，現在改成了「人均」；基層自治首次納入總體政治制度。也首次提出「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強調在「初次分配中」體現公平以遏制貧富差距、強調「與腐敗水火不相容」，提到「廉政文化」這樣的用語等等，在在顯現了發展觀念與發展模式的轉化，在政策大方向已經確立的情況下，展現中共落實政策方向的誠意與決心，這對社會發展的推進才具有指標性的意義。

三、科學發展觀的建立是中國大陸逐漸從修正主義轉化至以「科學」為名的空想社會主義。

根據上述，胡錦濤所標舉的「均衡發展」與「和諧社會」政策，固屬對症下藥，切合社會需要，但其關鍵不在方向為何，而在能否真正落實？

首先，有關「全面小康」問題，此次「政治報告」雖然提出「必須堅持統籌兼顧」，但由於中央政府資源有限，上述教育、醫療、社福等政策的落實，以及區域與城鄉差距的消弭，往往有賴於地方政府的資源投入與政策執行。不過，由於內陸貧瘠區域，地方財政匱乏，

面對各種政策宣示，部份地方虛應故事，甚至從中截取自肥，實難貫徹現有的社會發展政策。尤其在保障人數增加及保障標準提高之雙重壓力下，對財力本已拮据的中西部地方政府而言，能否徹底落實當然不無疑問。

其次則涉及「和諧社會」政策的落實。以「維權」運動的作用而言，受到不合理對待的群眾將越來越傾向以政策與法律為護身符，勇於抗拒示威。再則民眾可能誤以為獲得中共中央充分支持，盼求高層介入干預以藉此糾正地方不法。由於為求社會關注，反助長鬧事的動機。此外，為能確保「和諧社會」，政府處理群體事件，往往選擇妥協姑息，易導致「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同樣將助長群體事件的日益滋長。

「全面小康」的落實，關鍵在於中共中央能否有效收權，強化其資源統籌能力，但卻可能導致地方失去發展動力，經濟增長因此趨緩，再則可能因此招致地方反彈。其次，涉及「和諧社會」層面，則有賴雙方互動過程中，能否將群體事件、社會抗議，有效納入制度化管道中，並透過制度機制進行紓解。從胡溫體制越來越順應民情的方向，應該會使中共的威權主義走向溫和、軟化，更符合以人為本的要求。

科學發展觀堅持以人為本，這直接構成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根本目的。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以人為出發點，著眼於人的問題。一切為了實現人民群眾的利益。如果離開以人為本，和諧社會就將成為空中樓閣；如果不能使廣大群眾越來越充分地享受到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成果，和諧社會建設也只是空談。

自 SARS 以降的最近一段時間，包括山西潰壩事件、三鹿奶粉事故等重大安全事故，造成平民百姓生命財產的重大損失。這些重大事件與事故的發生，除了與一些企業及個人的疏失有關，更主要的因素是政府部門及有關幹部缺乏宗旨意識、大局意識、憂患意識、責任意識，作風飄浮、管理鬆弛、工作不紮實有關，有的幹部甚至對關係群眾生命安全這樣的重大問題麻木不仁。一些黨政幹部的所作所為，顯然與「以人為本」的理念相背離，與科學發展觀的宗旨相違背。

落實科學發展觀，必然要摒棄那種「沒有發展的增長」，甚至是「負效益的增長」。並需要恪守實事求是的原則，思想理論確實轉為具體的政策實踐。學習與實踐科學發展觀，關鍵是在與實現經濟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那些不匹配之處發揮作用，即進一步深化行政體制改革，推動服務型政府的建設。同時，進一步提高法治水準，為可持續的市場經濟發展提供公平穩定的機制。

中國大陸行政體制改革的目標具有多樣性，包括提高行政效率、轉變政府職能、堅決打擊腐敗勢力以及穩定社會等。而就首要目標而言，應當從實行增量改革、穩步推進民主入手，使民眾實實在在地分享到改革和發展帶來的成果。毫無疑問，一個學習並實踐科學發展觀的社會，一定是一個以民生為本的社會，是一個堅持公正理想的社會。³²³A 教授也同意此說法，他認為：「科學發展觀應該是比較強調社會公正這一塊，中國以前是效率，現在轉為社會公正，這已經產生了很明顯的轉軌。它這中間有一個平衡，就是既要保持發展效率，又要保持社會公正，這東西很難搞定。」過去政府多說沒有經濟發展哪來社會公平。於是，先發展經濟再談社會公平就成為主流價值。但是，一旦經濟發展之後，卻很少政府官員、黨政領導或經濟學者真正在乎社會公平。

不過，發展模式轉化的困難徹底從農民工大規模返鄉看出端倪。³²⁴農民工大規模返鄉無外乎兩種情況：一是農民工自己選擇的結果，如果他們認為在農村生活比城裡好，自然會心甘情願回到農村。二是出於自己別無選擇的結果，比如因為工廠倒閉或裁員而失去工作。近幾個月來湖南、河南、江西、四川等勞動力輸出大省的農民工返鄉率明顯增加，更多是因後者。民工返鄉帶回去的不是現金、消費和人均純收入數字的增長，而是再就業的困難和基層穩定的巨大壓力。全球金融危機讓中國迅速發展的經濟突然放緩，讓許多從農業省份來到都市，供給中國工廠廉價勞動力的大量民工，因為失業而開始出現大規

³²³ 〈落實科學發展觀方能破解當下難題〉，《第一財經日報》，2008年9月24日，
<<http://finance.jrj.com.cn/2008/09/2402382129447.shtml>>。

³²⁴ 民工提前返鄉潮體現在此次金融危機中，出現倒閉破產的中小企業多為企業結構落後、產品附加值低、缺乏自主創新的勞動密集型企業。所謂的勞動密集型、資源消耗型、高能耗的產業在這次危機中受到較大的衝擊。通過此次金融危機可以看出，一方面國內的企業亟需轉型升級，另一方面國內經濟和產業結構亟待走向優化。這個問題更突顯出發展模式轉化的重要性。

模的返鄉潮。華爾街日報報導說，這些民工曾是中國經濟重要推手，現在卻成了社會穩定的隱憂。

199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莫里斯（James A. Mirrlees）教授於2008年11月13日在北京接受記者採訪時指出，中國大陸擴大內需應首先提高農民收入和保障。針對各國應對金融危機的舉措，莫里斯表示，各個國家的措施都差不多，都是加大投資，但是在中國大陸來說，要擴大內需，就要加大直接針對消費的投資，尤其要相應提高農村居民的收入，同時改進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對於中共目前出台的一系列財政措施，莫里斯表示非常贊同，他認為政府能做的就是快速增加財政支出，一是向社會低收入群體提高補助，二是增加投資。在他看來，中國政府增加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的計劃是比較優化的措施之一。³²⁵

然而，歷史經驗表明羅斯福「新政」之所以成功，是在於它有效緩解了社會上收入差距等問題。新政前的美國社會處於工業化中、後期，社會資源分配差距逐步擴大不亞於現金的中國大陸，形成了社會財富過度集中在少數人身上與消費需求之間的不平衡。新政藉由救濟和以工代賑政策、社會保障法案、公平勞動標準法等舉措，在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縮小社會資源分配差距、促進消費增加、促使美國向福利化社會轉型方面發揮了重大效果。

從擴大內需的4萬億投資的內容結構觀之，雖然包括有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保障性安居工程、提高城鄉居民收入等，但更多的資金是投向鐵、公路、機場等交通建設和城鄉電網建設等，能夠直接拉抬經濟增長但解決就業及收入問題卻有限的項目。大規模的政府投資如果不能對就業和收入起帶頭作用，很可能就是一次簡單的投資擴張，並無法為中國大陸經濟的長期繁榮奠定穩固的需求基礎。

鄧小平說的共同富裕事實上就是接近和諧社會的說法，但是先富起來的人必須放棄或讓出自己的部分利益給農村，而正是與當初共產主義失敗的原因相同，多數人總是認為自己獲取的好處是自己爭取來

³²⁵ 〈諾獎得主：中國擴大內需先提高農民收入和保障〉，「新華網」，2008年11月14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11/14/content_10355899.htm>。

的，不是依靠誰而得來的，但實際上先富者多半是沿海城市的居民，他們本來就是靠不平衡的發展模式起來的。

奉科學社會主義為圭臬的中國共產黨並沒有消滅私有經濟、發展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當前的作為可以說都是背道而馳。因此，科學發展觀的建立是中國大陸逐漸從修正主義轉化至以「科學」為名的空想社會主義。

綜觀中國大陸現今發展模式仍是以經濟發展為主，中共雖然逐漸發現出問題的所在，並嘗試解決問題，但是在巨大的利益轉移與社會穩定等考量因素之下，科學發展觀的提出與建立似乎已有向「以人為本」的目標逐步邁進，向社會主義回歸，但是，科學發展觀雖然影響中共未來走向，但未觸及問題核心，有避重就輕的考量，仍難擺脫雷聲大雨點小的口號式標語的批評。因此，筆者認為目前的中國大陸的發展現狀僅可稱為「科學發展觀的初級階段」³²⁶，距離落實科學發展觀的精神仍有許多方面需要磨合及改善，發展模式的轉化雖有進展，然而制度沒有根本革新的前提之下，根本無法徹底解決問題。

第二節 研究建議

中共歷代領導人為了自己的歷史地位，都積極建構自己的政治思想與政治理論。科學發展觀是由胡錦濤所提出的思想理論，納入中共黨章可以確立胡的歷史地位、作為新時期指導思想。但是本文探討重點不在於胡錦濤個人權威的樹立，而是在於檢視科學發展觀對中國大陸發展模式轉化的實質影響，檢視其是否向社會主義回歸。

黨章在中共全黨具有最高的權威性和最大的約束力，是全黨共同遵守的基本準則，一旦列入，勢必要全力奉行。但科學發展觀雖已成為胡錦濤的代表理論，他卻未表明什麼是科學？什麼是發展？因為科學與否、發展與否，絕非由專家學者來定調，也不是任由群眾來認定，而是必須經由中共中央來討論與認定，使得科學發展觀徒有理論建

³²⁶ 受訪的 B 教授認為：「因為中國畢竟是一種比較特殊的體制，地方這麼大，人又這麼多，每一步都要做的比較謹慎，所以在這種情況下，要多快解決這些問題？我看不是這麼容易的事。又說：講科學發展整個社會就很協調？這是比較難的事情，所以要解決起來也是比較不容易的事情。科學發展觀如果要落實，繼續發展的話，還是需要考慮解決這些（包括政績觀...等）問題。」

構，卻不知有何實質作用與規範的質疑。雖然幾位受訪學者認為指導思想本來就不須具體，如此才有彈性調整，但是反向來說，不夠具體也造成各自解讀的主觀判斷問題。

Michael Polanyi 在其《個人知識：邁向後批判哲學》³²⁷一書中，明白指出，再怎麼客觀，科學是不可能做到絕對客觀的，頂多也只是相對客觀而已，也就是說科學本身仍存在著價值判斷的個人知識成份。因此，胡錦濤為首的中共中央主導何者是科學？何者是發展？來認定中國大陸該如何科學發展？這種藉由科學為領導集團背書的辯證思維永遠立於不敗之地。

不過，由於科學發展觀著重長期規劃與協調發展，因此中共未來不得不將會更依附學者智庫與專業人士的意見，將無法凡事以政治思維出發。它的目的，或許在於提醒中共各級幹部與官員，要用全面化的科學知識，來面對各種社會建設的工作，以免造成各種嚴重的後遺症與可怕的弊端。因此，科學發展觀的建立用意大體上來說是好的，但是如何發揮有效的作用才是重中之重。

西方社會現代化過程中的問題，包括環境污染、貧富分化、社會不公等弊病，當前的中國大陸被不同程度地複製著，再加上中國崛起提升了其他國家對其加強防備，中國大陸的發展模式轉化倍受考驗。基此，建立科學發展觀是對傳統發展模式的反思。中共十七大強調以人為本的發展，把民生問題當作第一要義，這是經濟發展理念、價值的省思與重建，值得肯定。根據當代不少世界發展中國家的經驗，通常達到了聯合國所規定的發展目標，但是大多數人民的生活水準並沒有實質改變，甚至出現經濟增長政策通常是以犧牲農村和農業發展為代價，形成城市階層高收入，而大多數農民依舊貧困的現象。中國大陸若能有效執行此一政策，或許將形成值得仿效的「中國發展模式」。

馬克思說：「人們在生活的社會生產中，會形成一定的生產關係，這種生產關係對應於人們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並且無可避免

³²⁷ Michael Polanyi 著、許澤民譯，《個人知識：邁向後批判哲學》，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

地獨立於人們的意志之外。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了社會的經濟結構，一個真實的基礎，在它之上矗立著法律和政治的上層建築，以及和它相應的社會意識的一定形式。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政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並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的，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時，會和它一直在其中活動之既有的生產關係發生衝突，或者以法律方式來表達同一件事，就是會和既有的財團關係發生衝突。這些關係因而從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轉變為生產力的桎梏。於是，展開了一個社會革命的新紀元。隨著經濟基礎的變化，整個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快或慢地轉型（Max, 1859, in Tucker, 1978:4-5）。³²⁸當前的中國大陸便是面臨這樣的處境。

人均國民收入的有效增長說明了致力於發展生產力所帶動的經濟發展成果已經展現，³²⁹但是沒有「質」的提升的增長是不可持續的，沒有「量」的增加了的發展也無法持續。對發展而言，增長是最基本的指標，沒有經濟的增長就談不上發展，但是過於強調增長的結果就是導致發展的不平衡，甚至妨礙發展。發展對於中國大陸的意義是毋庸置疑的，唯有發展才造就了今日中國大陸的進步與繁榮。

經濟發展是中共賴以維持統治的最大基礎，此與其他威權國家並無不同，經濟出現重大變化，社會和政治是不可能維持一成不變的。整個中國大陸發展的方向，以經濟發展為核心，這點並沒有錯，總比過去搞階級鬥爭要好得多。但是，其經濟發展面臨的最大挑戰，是政府利用權力配置資源，扭曲了各項資源的市場價格，帶來過度投資、產能過剩、低水準重複建設等等一系列問題。目前對政府職能、對導致過度投資的資源配置的制度性改革還處於起步階段，也就是市場化改革仍有相當大的努力空間。這方面的改革，除了尋求意識形態、觀念的反思與共識外，也需要更細緻化、更具體，以及更具可操作性的政策才能實現。

現在中國大陸經濟還在高速增長時期，分利雖有不公，但基層也不至一無所有，社會穩定還有可能勉強維持；但只要經濟放慢，社會

³²⁸ 龐建國，《國家發展理論—兼論台灣發展經驗》，台北：巨流圖書，1993年6月，頁118。

³²⁹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報告顯示，截至2007年，中國大陸人均國民總收入達到2360美元。按照世界銀行的劃分標準，中國大陸已經由低收入國家躍升至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國家行列。

分利不公的潛在危機就會隨時爆發。要保持社會穩定，中國大陸政府推動改革是宜快不宜遲。³³⁰ 主要問題仍在於各個利益團體間彼此的拉距使得中共陷入政策兩難的危機，改革發展之路佈滿荊棘。

另外，中國大陸處處充滿了不公不義與貪污腐敗等嚴重的問題，除非其他建設能與經濟發展相適應，否則根本是積重難返。其最難以克服的問題在於中共一黨獨大的領導模式，它將政黨的利益置於國家福祉與人民利益之上；領導階層的利益高於人民權益，漠視民間疾苦、社會不公不義、人權等問題。若能將經濟發展由量的擴充向重視生活品質和社會公正的方向轉變，十七大報告中所提的這些政策理念的最終才得以實現「和諧社會」。

另外，政府可能投入非常多資源來完善社會的安全網，但許多人不知情。政府投注很多心力於公共事務上，但實質落實有多少、其中又有多少對民眾是有實質助益的，這些問題都應該由政府透過各種管道，聆聽各界的聲音後以調整出最理想的決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威權習性，仍與政府機關文化緊密結合，「習慣成自然」地阻卻民間參與公共政策的討論或制訂，導致行政效能不彰、浪費公帑、弊端叢生，施政品質亦低落。

再者，政府浪費加大了財政負擔，排擠了科教文衛醫和社會保障等公共資源，損害了人民群眾的基本利益。主要是黨政兩套管理機構，十分龐大，又多方面重疊，遇事又相互推委，工作效率很低。特別是，一些地方買賣官職現象嚴重。許多關係民生的事務，長期拖延不辦；包攬事務太多，解決問題又太少，而都要讓納稅人負擔，卻又少為納稅人辦事！行政資源配置劣化與貪污腐敗情事嚴重是導是社會不公平的主因之一。

矛盾是推動發展的動力。面對新的矛盾，不能停止發展或者倒退的可能性，而要以新的模式繼續發展。科學發展觀首先是要具有科學態度，沒有科學態度，根本談不上科學發展觀。諸如人均收入問題、貧困問題、兩極分化等問題都必須要以科學的態度去思考和解決。其

³³⁰ 方德豪，〈薩科齊能，為甚麼溫家寶不能？〉，《亞洲時報》，2007年11月15日，
<http://www.atchinese.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42427&Itemid=110>。

次，一切按科學規律辦事。應要按人類發展的共同規律，依中國大陸當前國情來規律辦事。再則，落實貫徹科學發展觀，必須採科學的方法，用辨證思維看問題，而非僵化的、憤青式的、形而上學的態度。

在新的方針下，「為了發展的發展」將開始向「為了人的發展」回歸。「十七大」所揭示的「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等施政理念，更加注重「促進社會公平」、「解決民生問題」等確實是現實情況所需要的。唯近年來中國大陸內外問題交雜叢生，包括：重大貪腐弊案、環境污染問題、公共安全及意外事件、非法用工問題、維權抗爭活動、經濟過熱持續、民生物價持續上揚，通膨隱憂擴大等新問題，以及長期經社發展失衡導致之「三差」、「三農」、「三難」等陳痼積弊；再加上爭奪能源資源、人權問題、溫室氣體排放、產品品質安全等國際質疑與壓力，對中共執政及處理突發事件的能力產生重大的考驗。

從十七大看總體經濟發展戰略，在十一五規劃中，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原為又快又好，現則為又好又快，強調先要好再來才是快，表示胡希望藉此緩和經濟發展帶來的問題。而經濟發展政策分為兩點，一為提高研發創新能力，可預見未來將極力發展高科技產業；二為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但在經濟發展同時，並未窺見有效解決貧富差距的方案，後續發展值得觀察。

自從 1989 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中，就已經看到反官倒、反腐敗的訴求，鄧小平雖以武力鎮壓運動，但也開始積極反腐敗。在 90 年代盛傳：『如果反腐敗，就會亡黨；如果不反腐敗，就會亡國』，迄今中共仍陷入此困境中。2000 年之後，中共的宣傳強調如行政規定、黨內有黨紀規定，作為反貪的法律，乃至於抓了很多的貪官污吏，官愈抓愈高，所涉及的貪污金額愈來愈大，這些貪官污吏的存在正是發展模式轉化困難的根本性因素之一。

中共早在 2001 年十六大的政治報告中，就曾對黨內民主大肆宣揚，當時所提出具體的方向就是黨支部書記、村支部書記要用票選產生；如果這個政策能實行，將會是翻天覆地的變化，因為若能從最基層的黨部書記開放選舉，政治民主改革才不致流於口號，也具有指標

性意義，可是經過了幾年仍未施行。當時喊得震天嘎響，一旦宣傳期過了，卻又不了了之。³³¹

十七大時又積極宣揚黨內民主。其實宣揚黨內民主實為一種矛盾思維的產物，因為從民主國家角度觀之，黨內民主和國家的民主或社會民主並無必然的關係，甚至毫無干係，因為一黨之內的派系對抗與兩黨競爭的模式實質上大同小異，缺點反而是黨內惡鬥又必須取得利益平衡的弊端更為嚴重。

不可否認，中共的思維一直是想要形塑出比資本主義更好的發展模式，也確實不斷調整發展的理論，但是最令人詬病的問題在於尚未有更好的發展模式確立之前，借鑑國外較好的發展模式被視為走資本主義的道路，不符合中國國情，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實際上還是既得利益者可以透過現行的制度繼續把持好處、掌握資源，這才是發展模式轉化困難的根本原因之一。

科學發展觀著眼於解決當前中國大陸發展過程中所存在的問題，具有鮮明的現實針對性。提出「加快發展方式轉變和結構調整」這是對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發展模式和發展結構的轉變重要性的充分重視的體現，同時強調群眾利益，與十七大後的「又好又快」來緩解新出現的矛盾和問題。因為諸如：三差問題、三難問題、社保壓力不斷增加，人口增長、經濟發展同生態環境、自然資源的矛盾日益加劇，以及經濟增長方是滯後，經濟整體素質不高和競爭力不足等，種種不利因素嚴重制約了中國大陸的未來發展空間與速度。鄧小平曾說：「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³³²。但是人類並不會因此放棄發展，而是必須針對發展中所產生的弊端加以改善。

發展中的問題要用發展的辦法來解決，中國大陸當前最根本的問題就是發展不足的問題，只有透過發展來提升綜合水準，問題才能治標又治本。人民更關注的是，作為一個執政黨，中共如何回應社會大眾的期待、如何展現執政能力、如何協助中國大陸突破困境。發展模式的轉化最基本的還是從轉變生產方式著手，但是面對轉型升級與全

³³¹ 根據筆者的了解，目前中國大陸許多地方已經有選舉方式的試點，如重慶市、貴陽市等，雖然採行公開的競選方式，但是人為的政治操作讓選舉的公平性遭受質疑。

³³² 中央文獻出版社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頁1356。

球不景氣的影響，依然困難重重。例如中共正在改變出口退稅政策，以幫助這些企業提高利潤率，減少失業人數，但海外投資者對這些措施能否持久持懷疑態度。從長期來看，他們認為中共將會繼續減少激勵措施。這一政策發佈的目的之一在於改善中國大陸的空氣和水土質量。退稅優惠可能也不足以幫助受經濟低迷打擊的許多中國小企業。

此外，出口一直是中國大陸經濟高速發展的動力之一。為應對經濟突然減速，中共近來反復強調要穩定出口。因為保出口是為了保增長，保增長是為了保就業。如果不能保持一定的 GDP 增長率，城鎮失業和農民工返鄉潮問題會凸顯出來，埋下社會動盪的隱患。為此，2008 年下半年，中共從去年的政策軌跡上出現大逆轉，3 次提高部分產品出口退稅率，就是為了扶持出口導向的勞動密集型企業，穩住當前嚴峻的就業形勢。

目前中國大陸社會中存在的大多數問題都需要、也只能通過發展去解決，但是如果發展思路、發展模式、發展理念不科學，發展本身也可能帶來更大的問題。只有落實科學發展，才能走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道路，實現速度和結構、質量、效益相統一，經濟發展和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

不論是經濟人權或環境人權，關鍵問題在於政府政策的規劃與執行。無論是抑制房價或是污染防治，我們都可以發現最大的敗筆正是中央層級各部門間的政策政出多門、相互牽制。³³³由於體制的缺陷讓許多領導幹部和官員能上下其手，爭權奪利，因此，中國大陸如要改革成功必須從制度及法治上著手，因為近幾年是中國大陸頒布法律最多的時期，數量超過過去五十年，但效果顯然有限，關鍵就在於有法不落實、不執行。

發展觀轉化的困難從領導幹部與官員的作為可以看出，對沿海官員來說，過去把 GDP 放在第一位，既有政績又有油水可撈，現在被要求要搞和諧及環保，除了政績表現受影響之外；過去改革開放所遺

³³³ 李有容，〈經濟與環境人權觀察〉，財團法人台灣民主基金會編，《2008 中國人權觀察報告》，2007 年 12 月，頁 105。

留下的問題，一時之間也無法解決，在考績受影響又無油水可撈之際，陽奉陰違的現象當然屢見不鮮。

中共新修正黨章第六章對其幹部提出了新的要求，第三十四條第一款增寫了帶頭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內容，第二款中的「在社會主義建設中艱苦創業，做出實績」修改為「在社會主義建設中艱苦創業，樹立正確政績觀，做出經得起實踐、人民、歷史檢驗的實績」，第五款增寫了加強道德修養的內容。這樣修改，要求各級領導幹部增強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自覺性和堅定性，有助於提昇各級領導幹部的發展觀。

新加坡東亞研究所所長楊大利說，看到利益集團之間社會各階層之間日益失衡的中國執政黨，正在轉變理念，更加注重地區平衡，轉變是合適的，改革的政策也是正確的，但是，效果還不夠。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我想這樣的轉變應該能起到真正的作用」。³³⁴

許多國際媒體對中國的十七大召開給予正面的評價，但從這個角度來看，就表示外國對於中共的黨內文件內容認為是真的，所以非常重視，因此胡錦濤等中共領導人便無法不積極做決策。

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吳國光教授在《國家、市場與社會》一書中表示，中國大陸開始轉移到與「發展型國家」相類似的位置。總體來講，國家能力在這方面沒有受到巨大的破壞。中國大陸面臨的悖論：如果要實現秩序，就必須付出喪失自由和繁榮的代價；如果不實現秩序，也會因為混亂的加劇而終於喪失失去發展自由和持續繁榮的可能。要解決這個基本悖論，問題不在於是否加強國家能力，而是在於加強什麼樣的國家能力。³³⁵而科學發展觀就是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現又好又快的發展。從「發展是硬道理」，到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再到「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都未脫離「發展」。因此，國家能力所要加強就是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³³⁴ 〈中國已無回頭路〉，「中新海南網」，2007年11月1日，
<<http://www.hi.chinanews.com.cn/hnnew/2007-11-01/95074.html>>。

³³⁵ 吳國光編，《國家、市場與社會：中國改革的考察研究－1993至今》，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95-101。

從「關注三農」到「社會發展」再至「改善民生」，從縮小差距至公平正義再至和諧幸福，體現胡溫從科學發展觀到構建和諧社會，亟思轉變治國理政思維的積極作為，一方面應對前進中面臨的深層次矛盾和改革衍生的各方面難題，遏制情況惡化；另一方面形塑下屆黨代會指導思想，逐漸建構自身理論體系。但倘未能革除既得利益群體抵制，從建章立制角度通盤考量、整體配套推動改革，現存各種深層次問題仍不易妥善解決。

當前中國大陸各地正在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重新審視和調整發展思路與戰略。從一定意義上說，這正是吸取和借鑑國際上發展觀演變的經驗教訓的結果。中共如果能有效改善這些問題，那就是世界的奇蹟與寶貴經驗，反之亦然，對西方發展模式也是一種借鑒。

實際上，科學發展觀的確立強化了中共領導採行的漸進決策途徑。因為，只要有一系列的改革口號提出，即便有部分民眾不滿意，但是許多民眾也勉強可以接受政府仍持續運作與改進的感覺。漸進決策途徑強調決策者在作決策時，著重於既有的政策或計畫中去尋求漸進地替代方案，並不會有太大幅度的調整。這種途徑最為人詬病的就是過於保守、易導致社會的不公正、及不適用於重大決策情況。然而，此種決策途徑仍適用於處理結構不良的問題。

若是科學發展觀，就必須反映事實，就要根據通貨膨脹的變化來調整國民經濟統計。若是統計數字較貼近事實，中國大陸 GDP 的實際年增長率就不可能經常逾 10% 以上了。就現實情況論，中國大陸的經濟增長有浮誇之嫌³³⁶，例如中科院發布的「國家健康報告」³³⁷所闡述的實際上是違反科學發展觀的錯誤統計與巨大誤差所造成的數字假像，甚至淪為笑柄。³³⁸既然是假像，何謂「健康」？

³³⁶ 受訪的 A 教授表示：中國大陸的統計數據都是處理過的。那些統計指標的計算多是有問題的，例如房價、社保，它是不列入人均收入計算的，所以那些數據無法真實反映出整個經濟的動態，只能反應某些數據有變化。有些統計數據不可避免的是有政治的考量，但是有些還是非常公正的。

³³⁷ 中科院國家健康研究課題組於 2008 年 10 月 7 日公布的《國家健康報告》，國家健康指數(NHI)報告顯示，中國正迅速由傳統的「財富型」和「力量型」國家向「健康型」國家轉型。特別是在評判一個國家是否在維護國際和平、消除貧困、發展援助等方面勇於擔負並執行責任的「國家責任指數」中，中國排名第一位。

³³⁸ 詳見〈國家責任指數中國 No.1 中科院成笑柄〉，「大紀元」，2008 年 10 月 18 日，
<<http://www.epochtimes.com/b5/8/10/18/n2301315.htm>>。

從以經濟增長為核心到以社會全面發展為宗旨這一發展觀念上的轉變，可以說是從狹義的發展往廣義的發展的轉變，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走向。不過，這一觀念的轉化不代表對傳統經濟發展觀的全盤否定，而是不再完全以經濟增長為主體，是將經濟發展視為社會總體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歷史經驗表明，經濟發展是社會其他方面發展的基本條件，而社會發展和諧是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關鍵。因此，中共提出科學發展觀是突破了「經濟發展就是發展全部內涵」³³⁹的狹隘觀念，開擴了發展的概念，將社會的發展看作是全面的、協調的、可持續的發展過程。

經濟體制改革要重新調整利益關係，改變人們的行為方式，肯定要引起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的震盪。要求沒有震盪，就是要求不要改革。但是短時期內各方面震盪太大，事實上又會妨礙改革。變革會影響穩定，但變革又需要穩定，這就是事情的矛盾之處，妥善解決這個問題的前提是具體分析改革引起的震盪。有一類震盪是改革所必需的。例如，為徹底貫徹按勞分配，獎勤罰懶，鼓勵競爭，提高效率，必須觸動各種「大鍋飯」、「鐵飯碗」，這勢必要改變人們過去習慣的勞動態度、工作方式和分配格局。沒有這種震盪，改革就達不到目的。

但是需要研究的是，這種合理的震盪在一定時期內應當採取什麼樣的辦法，控制在怎麼樣的限度之內，才不會導致過大的不穩定發生。另有一類震盪並非是改革必須的，但改革過程中如果措施不當也有可能發生。例如，工資獎金增長過猛，投資規模擴大過快，造成物價總水平迅速上升，達到社會難以承受的程度。這樣的震盪無疑會破壞社會穩定，進而改革難以繼續前進，甚至完全倒退。為避免這種局面出現，必須有一整套的控制和配合辦法。總體來說，要处理好變革與穩定的關係，需要做好下述幾項工作；1.制定科學的方案；2.進行深入的宣傳教育；3.培訓大批合格的幹部。³⁴⁰

社會正義意味著對社經不平等進行矯治，大規模的社經不平等之

³³⁹ 經濟增長是經濟發展的前提和基礎，經濟發展是經濟增長的結果。沒有經濟增長就不會有經濟發展，而經濟增長不必然意味著經濟的發展。光是片面追求產出的急速增加，罔顧其他人民的福祉，忽視資源的浪費與付出龐大的環境與社會代價，將導致高增長低發展或有增長無發展的局面。

³⁴⁰ 郭樹清，《穩定的變遷》，香港：和平圖書，2005年5月，頁128-129。

所以被認為不正義的，主要是因為其使生活機會或生活資源的分配失去了公平性，助長了金錢政治或黑金政治，並且不利於社會的穩定和整合。例如，羅爾斯（John Rawls）的《正義論》裡，促進社經平等最重要的理由在於維護所謂「政治自由的平等價值」³⁴¹以及「公平的機會平等」³⁴²。

另一位著名的正義理論家華瑟（Michael Walzer）則從「多元平等」的理念出發，主張建立起一個強而有力的福利國家、對政治獻金設限、對社經不平等進行矯正，以排除金錢對生活需要、經濟安全、政治等領域之不當影響。³⁴³華瑟強烈反對羅爾斯的差異原則，但主張一個「強而有力的福利國家」，以確保共同體成員的經濟安全和基本需要獲得滿足。至於機會公平等之促進，華瑟強調必須透過長期的經濟分配與社會重建才能成功。³⁴⁴

貫穿十七大報告的科學發展觀，從當初的指導「經濟」到統領「全局」，內涵不斷豐富，地位不斷上升，明顯意在整合經濟與政治發展，將過度迷戀 GDP 和效率的改革列車轉向公正與和諧，令民衆共享成果。如此重視分配和均衡增長，強調公平與正義，這當然是進步。³⁴⁵

至於如何整合政經社會的發展？鄭必堅認為改革特別是要推進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以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為內涵的政治體制改革，和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體制改革。而改革之是否有成效及成效之大小，歸根到底還是要看是否有利於破除一切仍然束縛這「三個力」³⁴⁶的思想障礙和體制障礙，從而進一步解放這「三個力」，以更好地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

³⁴¹ 「政治自由的平等價值」是指每一個人對於一種平等的基本自由之完全適當體制（scheme）都擁有相同的不剝奪的權利，而這種體制與適於所有人同樣自由體制是相容的。摘自 John Rawls 著、姚大志譯，《作為公平的正義—正義新論》，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 年 3 月，頁 70。

³⁴² 「公平的機會平等」是指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應該滿足兩個條件：第一，它們所從屬的公職和職位應該在公平的機會平等條件下對所有人開放；第二，它們應該有利於社會之最不利成員的最大利益（差異原則）。來源同前註。

³⁴³ 陳宜中，〈社會正義 vs. 市場正義—論自由主義思想裡的兩種正義觀點〉，摘自張世雄，《社會正義與全球化：福利與自由主義的反思》，台北：桂冠圖書，2004 年 9 月，頁 68。

³⁴⁴ 同前註，頁 84。

³⁴⁵ 〈中共政改『開閘』但不『決堤』〉，「中國評論新聞網」，2007 年 10 月 22 日，<<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4/7/5/0/100475043.html?coluid=59&kindid=0&docid=100475043&mdate=1022112616>>。

³⁴⁶ 「三個力」是指一個是創新活力，一個是創業活力，還有一個就是承受、抵禦和應對巨大風險的能力和活力。

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在這裡，又一次表明了，實踐標準、生產力標準和人民最大利益標準可以而且必須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而達到更好的統一。³⁴⁷

簡言之，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在於中共的發展意識型態的轉化，不再過度聚焦於經濟增長上，逐步向和諧社會過渡。然而，爭議的焦點不在如何表述，而在如何執行。從總體上看，中國大陸的經濟增長方式尚未實現根本性轉變，與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的要求還有很大差距。

發展模式的轉化是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需要。如何保障經濟更加發展，力爭 2020 年實現 GDP 比 2000 年翻兩番，對中共而言並不是件容易達成的任務。經濟是發展的基礎，不轉變經濟發展模式，翻兩番的目標很難實現，其他包括民主、科教、文化、社會和人民生活等目標也很難實現。

無論從中國大陸內部資源儲量，或是外部納入的能源要求來看，其目前的經濟增長方式及其資源消耗強度都是難以為繼、不可持續的，迫切需要根本性的轉型。然而，科學發展觀卻很難執行下去，不是說不能執行，但是至少大打折扣。這個說明地方幹部領導追求政績、追求 GDP 高速增長的衝動，與對環境造成和將造成的破壞成正比，是不科學的發展觀形成的深層動機。

2008 年以來，中國大陸經濟面臨重大危機，在京奧結束還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已經接連發生山西襄汾尾礦庫潰壩以及河北石家莊三鹿奶粉這兩起危害嚴重、性質惡劣的重大公共安全事件。「襄汾潰壩」屬於生產安全問題，「三鹿奶粉」則屬於食品安全問題，都是以往已經一再發生、已經嚴肅處理卻又繼續一再發生的當代中國社會「老大難問題」。人們可以看到，中央政府在事件發生後已經迅速嚴辦各級主管官員及企業負責人，而且死難賠償和免費治療也迅速到位，但這些事後的「積極舉措」恐怕已經難以挽回廣大民眾的消費信心乃至公共信心（因為更多的安全災難仍在繼續發生）。顯而易見的

³⁴⁷ 〈鄭必堅談改革開放—讓中國活躍起來的決定性一招〉，「中國政府網」，2008 年 10 月 12 日，<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jrzg/2008-10/12/content_1118038.htm>。

是，以上舉措都仍然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被動療法，病根的診斷以及根治的藥方仍然付之闕如（治標不治本）。³⁴⁸

胡錦濤嚴肅指出，「從這些事件中反映出，一些幹部缺乏宗旨意識、大局意識、憂患意識、責任意識，作風飄浮、管理鬆弛、工作不紮實，有的甚至對群眾呼聲和疾苦置若罔聞，對關係群眾生命安全這樣的重大問題麻木不仁。顯然，我們從這些事件中得到的教訓是，必須抓緊解決黨員幹部隊伍中存在的突出問題，而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已成當務之急。」這對極力倡導學習與貫徹「科學發展觀」的中共而言，無疑是當頭棒喝。

中國的發展戰略必然要不同於傳統的現代化發展模式，而應採取符合中國國情的非傳統現代化發展模式，其核心思想就是實行低度消耗資源的生產體系，適度消費的生活體系，使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經濟效益不斷提高的經濟體系，保證社會效益與社會公平的社會體系，不斷創新、充分吸收新技術、新工藝、新方法的應用技術體系，促進與世界市場緊密聯繫的、更加開放的國際經濟體系，合理開發利用資源、防止污染、保護生態體系等。³⁴⁹

中共十七大報告中提出要「建設生態文明」，引起廣泛關注。這是在客觀分析中國所面臨的嚴峻的資源環境形勢後，對中國的未來發展模式的又一次界定；同時也是在客觀分析人類所面臨的全球環境挑戰的基礎上，提出中國對未來世界文明形態的基本構想。生態文明的提出，是基於對工業文明中不可持續的發展模式的反思。

要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徹底轉變，除了要擺正人與自然關係外，還必須真正貫徹以人為本的原則。應該認識到，生態文明雖然著重強調了保護生態、順應自然規律，但自然萬物本身不能參與到環境管理中，它們需要致力於守護自然的人們為其代言。國際社會提出可持續發展，是要力求實現「既能滿足當代人需要又不對後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而中共領導層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同樣將「以人為本」確定為核心。如果發展的目的真正是為了惠及民衆，那

³⁴⁸ 〈「中國特色」最需要堅持「社會主義本質」〉，「聯合早報網」，2008年9月29日，
<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6/forum_lx080929c.shtml>。

³⁴⁹ 胡鞍鋼，《中國走向21世紀》，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1年3月，頁149-158。

就不能在發展中破壞民衆賴以生存的資源環境；而在環境決策和管理中賦予公民知情權、參與權和司法救濟權，是保障公民環境權的最有效方式。

踐行科學發展觀，要致力於建設「生態文明」，讓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不再歡迎高污染的工業，這就是持續發展的理念。但發展較慢的地區相對受到較多的制約，諸如廢棄物排放標準較以往先發展地區為高...等，卻又不得不以犧牲環境的代價來換取發展。以廈門PX廠興建事件來說，不獨廈門，中國大陸很多地方都面臨著這樣的挑戰。要做出正確選擇，關鍵在於如何看待經濟利益和環境保護的關係，如何看待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關係。廈門的決定是環境保護，許多人都對廈門的決定給予高度評價，但是卻忽略了PX廠最後仍落腳在相對較落後且不遠的漳州，把高污染的工業從發展較好的地區移至發展較慢的地區就是科學發展嗎？

舊思維不創新、舊體制不改革，發展方式就難以轉變。根據筆者訪談的結果，一般民眾多半認為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強力宣傳，對於當前的社會公平的改善是稍有起色，但並沒有很明顯的作用，因為地方政府的作為與過去相較改變不大，例如：北京奧運為建設場館與周邊設施而強迫人民搬遷，卻沒有做好安置的舉措，即便是群體抗議也無法調整既定的政策，罔顧民意的需求。

十七大關注的焦點從「關注三農」到「社會發展」再至「改善民生」，從縮小差距至公平正義再至和諧幸福，體現胡溫從科學發展觀到構建和諧社會，亟思轉變治國理政思維的積極作為，一方面除了欲設法扭轉深層次矛盾和改革衍生的各方面難題，遏制漸趨惡化的困境；另一方面亦是形塑胡溫的指導思想，建構自身理論體系。不過，既得利益群體抵制的問題仍嚴重，未能確實從體制革新上做通盤考量、整體配套推動改革，仍在原來的問題及基礎上緩步推進，既有的深層次問題實難迅速有效地解決。

任何發展模式都是針對當時最迫切、最至關重大的、問題所擬定的。通常無法一勞永逸地解決發展問題，甚至經常出現以一種傾向掩飾另一種傾向的可能，亦即看似解決一個問題，事實上卻造成另一個

更棘手的問題，也導致繼續發展的隱憂。

表面上看起來，社會上對於「科學發展觀」的確立並無異議，然而，在許多人的心裡，尤其是部分領導幹部或行政官員的心目中產生激烈地衝擊，甚至常常出現陽奉陰違的舉動。主要包括：

首先，科學發展觀強調以人為本，重點關注對群眾利益的維護與改善，要求共產黨與政府更好地執政為民，為百姓服務。但是，尚有部分領導幹部仍舊將自己視為地方統治者，而沒有當作人民公僕的觀念，藐視民意，依自身的標準與喜好來決策與行事。

其次，根據科學發展觀所強調的發展，不僅著眼於當前，更注重長遠及後代的可持續發展，力求以全局的高度來考量發展思路。不過，部分領導幹部依舊囿於當地或該部門之利益，無法跳脫本位思想之窠臼，缺乏宏觀意識與眼界，經常只著重任期內所能完成的項目來彰顯自己，結果短視的行政行為造成看似建設成果豐碩，實則沒有發展或有礙發展的局面。

再者，科學發展觀追求全面、協調發展，是要求經濟社會全方位的發展，而不是單指經濟增長的一枝獨秀。然而，中共部分領導幹部始終無法扭轉經濟指標掛帥的刻板觀念，誤解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精神，落伍的「政績觀」依然根植在他們心中。

實際上，根據 C 教授的說法，什麼是科學呢？減碳量達 30% 是科學，那減碳量達 20% 就不科學嗎？科學有既定的標準，不是漫天的數據就是科學。許多官員雖然把科學發展觀的口號掛嘴邊，但是並沒有將科學發展觀落實到社會上，他們的決策與施政作為經常與人民想要的有很大的落差。這更突顯出廣泛在積極學習科學發展觀之際，抗議事件勃興、意外事故頻傳、環境污染惡化、生態破壞加劇等的關鍵原因所在。

另外，根據 C 教授的說法：廈門大學某教授科研計劃的需要，必須向民政局索取相關社會統計資料，結果得到的回應是本局目前沒有建置這方面的資料，這也就是說，強調社會協調發展的主管單位竟

然沒有相關統計數據與資料足以佐證當前的社會狀況，這樣實難稱得上是科學發展。

另一受訪者 D 教授說，也不能說中央提的科學發展觀都沒作用，只是什麼東西都可以牽扯到科學發展觀，像是和諧社會也都擴及到「和諧社區」、「和諧校園」...，感覺只是口號式的宣傳，民眾難有直接的感受。現代化理論認為價值觀的轉變是社會變革最重要的前提條件，科學發展觀的提出與建立對價值觀的轉變似乎有排山倒海之勢，但是在實踐上還不夠確實，因此社會變革的腳步仍然緩步。實現發展模式的轉變應當做到真正實現發展觀念的轉變。觀念是行動的先導，沒有科學的發展觀念，就不會有科學的發展行動。

中共社會主義的轉變是在探索試誤過程中，歷經政策變革、政治領導權力的鬥爭而逐步開展形成。因此，在如何繼續推進改革開放政策，與確保中共政權合法性，成為中共社會主義路線轉變的關鍵所在。其高舉社會主義的旗幟沒有絕對的正確或錯誤，以當前的角度與世界潮流來看，在人道主義的部份，毋庸置疑是正確的。對於要保障與照護社會上那些弱勢群體當然也是毫無疑問的。但是中共經常透過不合理的手段，強制去改變人民所有權的方式，這樣社會主義發展模式的堅持便會遭受質疑。

十幾億人的利益在發展中不可能一下子都得到滿足，人的利益和各方面要求是有層次的，要分階段有層次地逐步使部分群眾利益得到滿足，這是實現人民群眾利益的現實途徑。³⁵⁰遺憾的是，在發展中先行得到利益者並未全然將剩餘利益轉嫁到其他人身上，而是繼續掌控資源，壟斷其他人發展的機會，這才是社會發展失調的主要原因。

事實上，中國大陸當前許多重大問題難以改善的原因是政治體制遲遲不改革所致，因為缺乏相對應的監督與規範機制，卻反而推諉在以發展生產力為中心的不夠成功，嚴格來說，這根本不是科學發展應有的心態。

經濟體制改革必然會使各種社會階層和社會集團的利益關係明

³⁵⁰ 潘利紅等著，《中國共產黨發展觀變遷研究》，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1月，頁263。

確，並且促使一些新的利益集團出現。這是經濟體制改革所期望的，從根本上說是具有積極意義的。但是經濟體制改革必須謹慎安排這一過程的發展，因為在其他相關方面或環節滯後的情況下，利益關係的公開化可能造成種種不利影響。政治體制改革必須保證使已經明朗化了的經濟利益集團能夠公開地正常地表達自己的利益要求，換句話說，政治體制改革要使多元利益結構在政治上得以反映出來。³⁵¹

因此，科學發展觀要落實發展模式的轉化，不僅要不斷地進行宣導工作，還要先汰除領導幹部與行政官員的既有「政績觀」，改革檢驗發展的標準，讓領導幹部與行政官員擺脫「以 GDP 增長論英雄」的思維模式，不再汲汲於私營，既關注經濟發展，也重視社會協調發展。但是在經濟不景氣的同時，地方官員在「GDP 迷思」的驅動下，很可能重走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之路，擴大內需很可能成為地方官員為不科學的發展模式買單的藉口。原來受阻於環保門檻之外的項目，很可能乘虛而入，中國大陸近幾年在經濟增長模式、產業結構調整、環保等方面所做的努力，很可能功虧一簣。

當前，科學發展觀引領中國模式的發展方向是無庸置疑的，但是如何保持政策的有效性與連續性，讓此政策不至於隨胡錦濤卸任而政隨人亡，畢竟沒有人知道這些新政策會不會繼續實施？實施了以後會不會確實轉變？因為中國大陸領導人上任總會提出新口號來彰顯自己。³⁵²

2008 年 1 月 15 日，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指出反腐敗「在實踐中，要注意把握和體現改革創新、懲防並舉、統籌推進、重在建設的基本要求。要以改革精神推進制度建設，以創新思路尋求治本辦法，注重總結新經驗、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從我國實際出發，借鑒國外有益做法，創新工作思路，完善工作機制，破解工作難題，更加科學有效地防治腐敗。」³⁵³不過，香港的《開放》雜誌執行編輯蔡詠梅分析認為，他並沒有提到外國反腐敗一條最基本的方法：體制改革，對權

³⁵¹ 郭樹清，《穩定的變遷》，香港：和平圖書，2005 年 5 月，頁 189。

³⁵² 幾乎每一位受訪者都表示：換領導就會換口號，無論是中央或地方皆然。

³⁵³ 〈胡錦濤在十七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人民日報》，2008 年 1 月 16 日。

力進行監督和制衡。³⁵⁴

「中國社會希望透過思想解放，推動政治改革和民主發展。但中共對政治改革、民主發展沒興趣」。李凡批評，現在中共所提出的思想解放，基本是空話，缺乏思想深度，更談不上解放。他認為，中共的利益來自對權力的壟斷。維持現狀，是中共最大的利益公約數。因此，中共更強調延續「政左經右」的改革開放，而無政治體制改革的急迫需求。李凡說，為維護社會穩定和鞏固執政根基，中共以問責制、資本家入黨、增加民眾問政管道、強化政府治理，甚至黨內民主和監督的方式，回應社會的需求，而非進行政治體制的大翻修。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曾撰文指出，在中共體制下，中國的政治改革不可能出現自由主義式巨變。所謂的改革或思想解放，只是領導人為了鞏固自身權力基礎的話語權。

政大政治系副教授寇建文則表示，無論是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物權法，或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和土地流轉制，都在反思鄧小平的不均衡發展，所導致社會階級和地區發展的矛盾。九二年後的思想解放，主要在延續改革開放的路線上，修補路線的不足和缺失。所以，當前的「解放思想」更多是在解決現實工作的思維困境。³⁵⁵

綜合多位學者的意見與筆者的問卷調查分析，發現無論是學者還是一般民眾，對於科學發展觀引領發展模式的轉化多給予較為正面的評價。但是一般民眾似乎對於科學發展觀的政策推動較為樂觀，不若學者們持較保留的態度。

堅持科學發展，以人為本，就必須尊重民意，調動廣大民眾參與國家事務和社會生活的積極性。當今中國大陸民眾對決策過程的參與熱情高漲，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意識也不斷提升。因此，推進社會的科學發展，民意訴求是基礎，也是來源。如果，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改革同步進行；那麼中國大陸可能就可以提早邁向發達國

³⁵⁴ 〈胡錦濤：反腐敗具「長期複雜艱巨」性〉，「BBC 中文網」，2008 年 1 月 16 日，<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7190000/newsid_7191500/7191520.stm>。

³⁵⁵ 〈經改成功 30 年 政改上路遙無期〉，「聯合新聞網」，2008 年 10 月 13 日，<<http://udn.com/NEWS/MAINLAND/MAI1/4555447.shtml>>。

家的行列；中國大陸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將會更好、更快，全民的福祉將獲得更高的保障。

導致中國大陸發展問題、反差與困境的根本原因是體制與制度性弊端、政治改革滯後、經濟結構、發展理論與政策中的錯誤、缺失公正與信用、官商勾結等。雖然擴大內需等重要政策施行是出自於改善問題與促進發展的立意，³⁵⁶然而，再多的投資與資金是解決不了制度性問題的，應當通過深化改革政治體制，學習先進經驗，轉變不平衡的粗放模式為平衡模式，並逐步優化發展模式，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科學發展觀的提出讓這種轉化變得更加可能實現，但是前提是如何有效實踐，而不是僅強調理論的闡述。

中共只搞經濟改革卻拒絕或拖延政治改革的作法是不可持續的跛足改革，是導致中國大陸社會各種矛盾衝突日益激化的主要弊端。從發展的軌跡來看，歐美先進國家與新興工業國家和地區的發展模式，它們的發展水準已進入發達國家之列。其共同經驗與發展模式是「自由市場經濟制度」+「民主制度」。因此，在理論上與實踐上，國家不分大小，人口不分多寡，皆有機會成為發達國家。然而，缺乏民主，缺乏有效監督，缺乏人民參與，缺乏媒體開放，缺乏權力制衡等機制讓中國大陸發展滯後。如果，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改革同步進行，社會發展勢必會大幅進步，那麼中國才能盡早進入發達國家的行列，其現代化的進程也將會更好更快，全體人民的福祉將進一步獲得保障。

³⁵⁶ 根據 C 教授的說法：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必須從刺激民間消費著手，刺激民間投資意願，而不是僅依賴政府的公共投資，這是由於出口型的經濟一旦受到不景氣影響，外貿為主的產業便會受到嚴重的波及，失業問題便會湧現。因此公共投資雖能帶動一部分民間投資，但是效果有限，因為消費偏低的問題依然沒有解決，而這方面歸咎於收入偏低與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使得民眾不敢消費。